



我知道的
邓小平



我知道的 邓小平

刘金田 主编

“民主、果断、深思，是个伟大的战略家”

——万里谈邓小平

我投身革命的第一位领路人

——阿沛·阿旺晋美谈邓小平

他和少奇都是没有私心的人

——王光美谈邓小平

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小平同志的远见卓识

——林丽韞谈邓小平

“在外交上确实能高瞻远瞩，抓住最主要的问题”

——钱其琛谈邓小平

为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

——迟浩田谈邓小平

聆听邓小平的五次讲话

——荣毅仁谈邓小平

决策对外开放的几件事

——李岚清谈邓小平

相濡以沫五十八年

——卓琳谈邓小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知道的邓小平 / 刘金田主编.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80141-985-9

I. ①我... II. ①刘... III. ①邓小平(1904~1997)
—纪念文集 IV. ①A7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8126号

我知道的邓小平

著 者:刘金田主编

责任编辑:王 品

装帧设计:天下书装

版式设计:刘 栓

责任校对:王伟成

责任印制:蔡 旭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100009

电 话:010-64041652(发行, 邮购)

传 真:010-84045799(总编室)

网 址: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63.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10×1000 1/16

字 数:220 千字

印 张:19

版 次: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141-985-9

定 价: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作为邓小平研究的专业工作者，我们为考证一些史实，经常采访一些历史的亲历者和当事人。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们陆陆续续地采访了上百位同志，他们有的是邓小平的家人，有的是他的老同学，有的是他的老战友，有的是他的老部下，有的是某一事件的当事人和亲历者。上至领导干部，下至普通百姓，谈起邓小平，每一个人都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向我们讲述了邓小平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如他早年的读书生活，留学法国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他的军事生涯；他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他三落三起的传奇经历，他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的巨大贡献。这些故事深深地埋在我们的记忆中，也使我们萌生了将这些访谈编辑成书，告知后人的想法。

如今，当我们再次打开这些尘封的记忆，聆听当事人的述说时，仍然被其中的故事深深地感动着。为此我们从中撷取了 70 位当事人回忆的部分片断，编辑了这本《我知道的邓小平》，以表达我们对邓小平的深深敬意和不尽的思念。

当年接受我们采访的一些人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们留下的心声，更显得弥足珍贵。在此，我们要深深感谢每一位曾接受过我们采访的同志，没有他们，不会有今天这本书的出版。

目 录

前 言.....	1
 家世·少年·兄弟情怀	
—邓垦谈邓小平.....	1
 “我们大家都喜欢他”	
—郑超麟谈邓小平.....	6
 在中山军事学校的日子	
—高克林谈邓小平.....	8
 “说话不多，处理问题很果断”	
—黄玠然谈邓小平	11
 “小政委，挺能干”	
—黄荣谈邓小平	13
 从政治部宣传部长到政治部主任的两年	
—梁必业谈邓小平	16
 “他很老练，知道的事情很多”	
—刘英谈邓小平	24
 危难见真情	
—危秀英谈邓小平	28
 “善于抓大事，能照顾全局”	
—宋任穷谈邓小平	29

“打仗做事很痛快”	
—杨国宇谈邓小平	31
“像刘邓这样深的感情见得不多”	
—张香山谈邓小平	33
“关键时刻确实能起到关键作用”	
—陈锡联谈邓小平	36
“治军有方，治政更有办法”	
—李达谈邓小平	42
跟随小平十三年的四点感受	
—秦基伟谈邓小平	49
卡尔逊提的问题，他“非常正确巧妙地回答”	
—欧阳山尊谈邓小平	60
“对干部又严厉又体贴”	
—任白戈谈邓小平	63
“说话简洁、扼要，行事果断、干脆”	
—戎子和谈邓小平	65
“没有文化怎么能提高战斗力”	
—韦杰谈邓小平	70
必须严厉打击刑事犯罪	
—刘复之谈邓小平	73
“总前委写这个作战纲要，应该站得高一些”	
—张震谈邓小平	79
“民主、果断、深思熟虑，是个伟大的战略家”	
—万里谈邓小平	83
他要我去修成渝铁路	
—陈修和谈邓小平	89
我投身革命的第一位领路人	
—阿沛·阿旺晋美谈邓小平	90

始于毛，成于邓	
—薄一波谈邓小平·····	102
“他和少奇都是没有私心的人”	
—王光美谈邓小平·····	109
“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胡克实谈邓小平·····	114
中苏论战的主要当事人	
—阎明复谈邓小平·····	118
灵活的斗争策略	
—李越然谈邓小平·····	125
三年的下放，真正体会到了老百姓的疾苦	
—罗朋谈邓小平·····	128
中国永远不称霸	
—凌青谈邓小平·····	132
叶帅的力荐	
—范硕谈邓小平·····	136
要把资本主义先进的管理经验学回来	
—谷牧谈邓小平·····	141
改革是从 1975 年开始的	
—袁宝华谈邓小平·····	144
“铁路整顿得好，效果快”	
—黎光谈邓小平·····	153
“军队要由党掌握”	
—王平谈邓小平·····	156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李昌谈邓小平·····	158
请小平同志转交主席的一封信	
—刘冰谈邓小平·····	161

毛泽东对影片《创业》的批示	
——张天民谈邓小平	163
在小平身边服务七个多月的特殊日子	
——李守信谈邓小平	168
文件直接送到 25 号楼	
——王守江谈邓小平	171
陶铸的问题应予平反	
——曾志谈邓小平	173
“八八”讲话 影响深远	
——何东昌谈邓小平	175
“北方谈话”促进了我们思想大解放	
——王恩茂谈邓小平	180
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一个典范	
——胡绳谈邓小平	183
“在外交政策上处理得很活”	
——柴泽民谈邓小平	191
决策和推动改善中苏关系	
——刘述卿谈邓小平	197
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小平同志的远见卓识	
——林丽韞谈邓小平	199
“对台工作是大事，需要专职的人专门做”	
——汪锋谈邓小平	203
“在外交上确实能高瞻远瞩，抓住最主要的问题”	
——钱其琛谈邓小平	207
为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	
——迟浩田谈邓小平	211
支持农村改革	
——王郁昭谈邓小平	214

“杀出一条血路来”

- 王全国谈邓小平 220

聆听邓小平的五次讲话

- 荣毅仁谈邓小平 226

人间重晚晴

- 谭启龙谈邓小平 231

主持起草历史决议

- 邵华泽谈邓小平 239

情系浙江

- 铁瑛谈邓小平 247

第一次南巡

- 梁灵光谈邓小平 252

决策开发洋浦

- 毛志君谈邓小平 256

一定要抓住机遇

- 陈焕友谈邓小平 258

对深圳特区的情怀

- 李灏谈邓小平 260

第二次南巡

- 谢非谈邓小平 268

决策对外开放的几件事

- 李岚清谈邓小平 271

“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

- 黄琳谈邓小平 274

“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不能妨碍群众”

- 张宝忠谈邓小平 276

“他很体贴照顾人的”

- 邓先群谈邓小平 278

“他最喜欢小孩”

—栗前明谈邓小平 280

“我们这个家是非常和谐的”

—邓琳谈邓小平 281

“从来不说教，他都是言传身教”

—邓楠谈邓小平 283

“父亲还在我们身边”

—邓榕谈邓小平 285

相濡以沫五十八年

—卓琳谈邓小平 287

家世·少年·兄弟情怀

——邓垦谈邓小平

邓垦，1911年生。四川广安人。邓小平的同胞弟弟。先后肄业于上海暨南大学、上海政法大学。1939年入延安抗大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解放日报》编辑、中共吉北地委宣传部部长、佳木斯市委书记、佳木斯市市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泸州专署专员，重庆市、武汉市副市长，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副省长、省人民政府顾问。

邓小平是1904年出生，我是1911年出生，他最早的照片就是在法国照的。他是1919年离开家，直到1931年我到上海上学登报找他，隔了十三年，我们兄弟都不认识了。1939年我到延安，当时他在太行山前方，没有见到，直到1945年他去参加七届一中全会，我们经过了十五年才又一次见面。解放后，1951年我在西南重庆工作，跟他在一起，不过时间不长。1952年8月，他调到中央工作，以后我们之间也很少联系，见面很少，我去北京开会，有时到他家里坐一坐，谈一谈家常，对于他的一些情况，我也是间接从其他地方知道的。我谈谈我亲身经历和知道的一些事。

我们家是个小地主，破落地主，只有四十亩地。四十亩土地，在我们那里叫两百挑。父亲长期在重庆不回来，家里很困难，经常欠债。父亲过去在成都念书，也担任过县联防团长、乡联保主任等地方小官。他属旧社会的人，有旧社会的一些坏东西、坏作风。但他对旧社会不满，对我们兄弟俩参加革命，一直采取支持、拥护的态度，从来没有反对过。我们这个家的组成是比较复杂的，我母亲生了五个孩子：老大是大姐，叫邓先烈，老二就是邓小平，在男孩

子中排行老大，我们都称他大哥。接下来就是我二姐，邓小平走后不久她就死了。再下来是我，1911年出生，行称老二。再下来是我三弟，叫邓蜀屏，解放后到重庆上革大，后到贵州地方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逼死了。

我的母亲生了我们五个孩子，同时要承担全家里里外外的繁重事务，得了痲病，吐血，1924年左右就去世了。父亲找了继母，生了老四，叫邓先清，在成都工作。第二个继母夏伯根，原来丈夫姓陈，陈死后再嫁我父亲，她带来一个女孩，就是邓先芙，现在成都工作。夏到我家又生了两个女孩：一个死了，一个是邓先群。

夏伯根，劳动家庭出身，很能干，身体也很好，她跟我大姐的年龄差不多。她任劳任怨，大哥家的几个孩子她都带过，后来又江西待了三年。她会做四川泡菜，大哥喜欢吃。大哥家十几口人吃饭，四世同堂，每天吃饭要开两桌，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大哥家的几个孩子都很喜欢她，她也离不开孩子们，她对邓家是有功的，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们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都是单传，到我们这一代才发展起来。常到邓小平家的是邓先芙、邓先群两姐妹，因为她们的母亲夏伯根还在，经常去看母亲。其他人去得较少，有时也去看望他。按血统说，和邓家现在没有血缘关系的，就是邓先芙。

有这样一个故事，听我妈妈、我姐姐她们讲，我们那个家乡，有一个姓刘的，是个地主，和我们家和我父亲他们有些来往。那个时候父亲不在家，家里很困难。不是过年过节要写个春联吗？写个对子啊。那个地主他有文化，又会写又会画。那时候，就买了张红纸，请他写个春联。他那个家伙很坏，他就写了几句挖苦我们家的话。我家里面我母亲、我姐姐她们都不识字，不知道啊。小平看到了，看到了之后他很生气，把它撕掉，自己又买了几张红纸。他那时候还很小啊，自己来写，写个对子贴上去。

1919年下半年，大哥已在念中学了，由于欠了很多债，我父亲长期不在家，上学交学费都很困难。当时吴玉章几个人创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我的父亲在重庆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写信回家，要他去读留法预备班，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我父亲呢，极力主张，我母亲舍不得，不赞成。大哥很愿意去，加上家境困难，听说能出去留洋，也都做母亲的工作，家里面还有一场争

论，他就跟母亲又讲道理，又争论，最后还是说服了母亲，同意了，母亲很勉强地同意的。我那时只有几岁嘛，但是他走的那个情景，我知道，家里都集中啊，欢送他嘛，然后他就很简单地走了。行李，那个时候，四川农村出个门，背个包袱，里面有几件换洗衣服就行了。我们家离重庆还有二百多华里，要经过一个合川县。

大哥到重庆读书，在重庆念了一年多一点，就动身去法国。同行的有三人，一个邓小平本人，一个叫邓绍圣，是我们的堂叔，我们称他“幺叔”，另一个是远亲胡伦（胡明德）。这几个人既是同县（广安县）人，又是同乡（协兴乡）人，又是有些亲戚关系的，家里人还比较放心些。走的时候，大哥年龄很小，只有16岁。我记得走前，他由重庆回到家里看了看，我当时还很小，只有八九岁。他走时家里借了一笔钱。

我清楚地记得，他去法国两年后，家中突然收到他从法国寄来的一封长信，内容是说他参加了革命，参加了什么革命组织，要为国家富强、为天下穷苦人翻身解放而努力，不能回家了。从事革命活动就不能回家了，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家里。当然，家里嘛，父母特别是我的母亲很着急，很伤心的。我的母亲非常爱邓小平。她是那个旧社会的妇女嘛，邓小平是长子，母亲当时维持那个家庭是很困难的，她就很希望邓小平长大了以后，来管理家事，就盼望他回家来。旧社会嘛，老太婆嘛，希望他回家，这一下不能回家了。

他在信中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从此不能回家，也不能顾家了；二是要求废除旧式婚约。当时四川农村很兴娃娃亲，他很小跟一个姓唐的家庭定了娃娃亲。他来信提出这两条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母亲急得要死，急出病来了。大儿子不能回来，不能见面了，从此一直发病，过了大约两年多就吐血死了。唐家也很着急，后来慢慢说通了，那个姓唐的女孩子，我见过，很老实，在我家待过一年多，她后来也同意出嫁。她出嫁，由我们邓家办全嫁妆，是作为邓家女儿嫁出去的。

大哥在法国参加革命后，曾在赵世炎、周恩来指导下办过一份杂志叫《赤光》，他经常往家里邮寄，寄了有七、八期。我参加革命，我的思想是受他的影响，我当时才十几岁，还念小学，什么都不懂，只看到封面有光身子小孩，里面内容看不太懂，当时政府也不懂、也不管，我就存放在家里。到我念

初中后，逐步看懂了，什么帝国主义侵略、劳苦大众、劳农政府、剥削被剥削、苏维埃、人人平等、为穷苦人民谋利益等。1929 年我在家乡上中学，高中时代，我在南充。1930 年我到成都，1931 年春赴上海去上大学。我由“赤色群众”逐步走上革命道路，最早最初受的革命思想影响，就是大哥寄回的《赤光》杂志。

1931 年我到上海去求学，临走的时候我父亲要求我，说“你到上海去找找你哥哥”。因为胡伦曾给家里来信，说大哥可能在上海，我到上海就找吧。我父亲当时对旧社会也是不满意的，对我们兄弟俩参加革命，一直采取支持、拥护的态度，从来没有反对过，父亲知道小平在干什么。

我当时不到 20 岁，到上海后到处找老乡打听，上海有广安老乡几十人，打听不到他的下落。上海情况很不熟悉，语言不通，熟人也不多，找来找去没着落。我找得没有办法，突然想出一个幼稚的办法，当时我看到报上有很多“寻人启事”。结果我就到当时的《时事新报》登了“寻人启事”。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是 1931 年 5 月 1 日。当天该报只出半张报，启事内容就讲：邓希贤兄，我现在已到上海，住在什么地方，希望你见报以后来找我。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特务用这种方法抓人的也有，登报用亲戚名义，结果你去找会碰到特务。后来据他们讲，他们先派地下交通化装了之后，到我登报的那个地方来了解，看有没有几个四川人在这读书，其中有没有一个邓先修，房东说有，后来他自己亲自来找我。有一天下午，我们四个青年人，都是四川我们的同乡、同学，正在一个小房子里聊天，突然间进来一个人敲门，他登门时穿长衫，戴便帽，学者样子，一进门就问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邓先修。当时我想，我在上海没有熟人啊，怎么会有人找我？一下子想到了我登的报，一看这个面孔还有印象，因为他走的时候我只有七八岁，隔了十三年，变化很大，他那时二十八九岁，还有点印象。我就看出来了，我说我是邓先修。他说：好好好，你登了个报我们知道了。你收拾收拾跟我走，马上跟我走。我就跟他走，他在一个乱七八糟的地方预定一间房子，跟我谈话、接触。那个地方流氓、妓女、叫花子成堆，特务也不管。我们在一起，他先简单地问了一下家庭情况，那时候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我父亲还在。简单地说明一下，我这次到上海来，是求学的。我知道他早就是共产党员了，讲了我想参加革命的愿望。他说：“不要多说了，其他

的事情以后再说，现在你赶快回去，立刻搬家，越快越好。不仅你自己要搬，而且你那三个同学都要搬，全部离开这个地方。”并要我搬了新的地方后告诉他。我就知道了他的意思，因为我也参加了共青团。当时东西很少，一包东西，一张小铁床，我就搬到了一个同学家。

登报是1931年5月1日，他来找我是5月中旬，5月至7月他去过几次，我也去他熟人家见过他，一边打牌，一边谈话，别人不注意。此时一个姓戴的同志介绍我参加一个国际组织“赤色互济会”，救济狱中的同志。有时参加游行、集会，还搞“飞行集会”那一套。

几个月之后，大哥就去江西中央苏区了，我们分开了。在这期间他带我到张锡媛的墓地看了看。从这以后又过了十五年，“七大”以后我们又在延安见了面。

“文化大革命”时，我被关了八年，我虽然也算是个小走资派，但是抓我的原因完全在于他，每次追问我，就问我是怎么到上海找到邓小平的，我都实事求是地把经过讲一遍，他们不相信，我说如果你们不信就查当时的报纸，后来真的查找到了，这才完事。

虽然我们是亲兄弟，但是在一起的时间非常非常少。

解放以后，那一次不知道他是陪什么外宾，到了广西，回北京的途中，在武汉停了一下，住在东湖招待所。告诉了我，我去看望他。那一次，他是专门到我家住的地方来过一次，他也没有多少话说，到处看了看。他说，这个房子还可以嘛。我住的那个房子，是过去旧中国法国领事馆一个副领事住过的宿舍。广西的芋头，大芋头很好。他还带了几个芋头给我，好像还有什么东西我记不得了，就是广西的土特产，他带到武汉来了，专门给我的。有那么一件事，其他的没有什么了。

“我们大家都喜欢他”

——郑超麟谈邓小平

郑超麟，邓小平留法勤工俭学时的同学，1901年生，福建漳平人。1922年6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3月去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回国。曾任中央宣传部秘书。1929年加入托派组织，被开除党籍。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

1922年2月到1923年3月，我和邓小平在法国的哈金森工厂一起做工，一起住了有十三个月，直到我离开工厂。

那时候，家里有钱的可以进大学，像我家拿不出钱来，1922年我没有办法了，就跑到工厂工作。这个工厂，当时一共有一千多名工人，大部分是女工和童工，男工少，男工主要是干重活儿，女工劳动轻，每天干八小时，男工每天要干十个小时的工作，收入很低。

在这个工厂做工的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有三十多人，中国学生有的做车胎，有的做雨衣，大部分做橡胶套鞋。在离工厂不远的一个小树林中，工厂拨出一个木棚，内有四十多个铺位，专门供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住，大家搭伙做饭。当时住在木棚里的中国学生是流动的，来的人住一个月两个月就走了，又来一些新的人。在木棚中一同居住过的有邓小平、黄齐生、王若飞、汪泽楷、李慰农、尹宽等。在三十几个学生当中呢，邓小平的年龄最小，除了他以外，恐怕都是二十岁以上的人了。我们大家都喜欢他，就是把他当作小孩子，喜欢同他讲话，同他开玩笑，同他玩儿。

回国以后，在上海中央同邓小平在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1927年以前，

中央机关各部门可以互相来往，1927年，中央从武汉搬到上海以后情况变了，那时白色恐怖很厉害，我们中央各部门就不相互来往了。我参加中央的几次会议，都是有人带我去的，去过之后就忘记了。邓小平和中央秘书处住的地方我从来没进去过，并且也不许去，平常来往都是交通送信来往。我和邓小平平常来往，主要是开会。

1928年1月，邓小平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的同学张锡媛结婚。张锡媛是河北人，比邓小平小两岁，他们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相识。张锡媛回国以后，参加领导了保定的铁路工人罢工运动，以后，到了武汉，派到中央秘书处工作，和邓小平一起在秘书处工作。后来两个人一起到了上海，邓小平是张锡媛的上级。张锡媛个子不高，人长得漂亮，追求她的人很多，但她看上了邓小平。

我记得他们结婚时还在广西中路聚丰园的四川馆子摆了三桌酒席，周恩来、李维汉等人，还有一些普通工作人员都来了，一共三十多人。我了解了一下，这个宴会钱是邓小平自己出的。大家吃完之后，好像菜已经吃完了，大家还有兴趣再吃，邓小平另外又叫来菜，让大家吃。我心里印象，大概邓小平家里很有钱吧。

婚后他们和周恩来夫妇住在一起，一家楼上，一家楼下。

他们结婚以后，我们就没有见过面。好多年以后，我听说张锡媛得病死了。什么病？听说是生小孩子死了，时间是和罗亦农牺牲的时间差不多，大概是1930年4月前后。当时料理张锡媛丧事的同料理罗亦农丧事的是一个人，就是李强。